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政策调整：内涵、动因与实施路径  
作者：毕亚娜，邓美薇  
网络首发日期：2026-01-26  
引用格式：毕亚娜，邓美薇. 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政策调整：内涵、动因与实施路径[J/OL].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https://link.cnki.net/urlid/32.1544.F.20260126.1521.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政策调整： 内涵、动因与实施路径

毕亚娜\* 邓美薇

\* 毕亚娜，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邓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通信作者及地址：毕亚娜，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南海大道 3688 号；邮编：518060；E-mail: b88.bb8@163.com.

**摘要**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极具潜力的新兴增长极，东南亚已成为各国战略竞逐的核心区域。在此背景下，面对国际竞争加剧、国内数字化转型滞后等多重挑战，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着政策调整的紧迫课题，其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呈现出显著的转型特征。具体而言，日本对东南亚的角色定位由传统的制造业基地、援助对象转向面向未来的“共创伙伴”，合作重点从信息技术援助拓展为社会课题的解决，区域联盟策略从双边技术合作转向“对美协调+对华防范”。为深化合作，日本采取了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强化数字经济议题设置与规则输出、推动初创企业孵化与人才合作等三大实施路径，这既是其巩固区域影响力、争夺数字规则主导权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国内发展困境的现实举措。

**关键词** 日本 东南亚 数字经济 共创伙伴 数字规则

## 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sup>1</sup>主要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等领域。<sup>2</sup>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东南亚凭借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成为世界数字经济的新增长极，其战略价值在印太地缘博弈中不断上升，吸引全球数字大国竞相布

<sup>1</sup> 鲜祖德,王天琪.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J].统计研究,2022(1):5;任雪,刘婉琪,周先东,秦瑶.数字经济概念内涵界定与统计分类改进[J].经济学家,2021(1):46.

<sup>2</sup>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EB/OL].(2021-04)[2025-05-15].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4/P020210424737615413306.pdf.

局。作为日本重要的生产基地、消费市场和受援助国，东南亚长期与日本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关系。但在印太地区力量角逐激化的背景下，诸多经济大国加强对其战略投入，东南亚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而日本在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面临诸多结构性障碍与严峻挑战，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其在东南亚存在感下降的担忧。<sup>3</sup>日本对东南亚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合作方式，目前正面临着失去优势的风险，<sup>4</sup>加强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是日本提升其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必然之举，政策调整与合作转型成为日本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经贸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经济大国在东南亚围绕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往研究可以归纳为“竞争”与“合作”两大主题。在“竞争”层面，以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战略价值的提升，使其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力场，美国、日本、中国等数字大国在东南亚展开了激烈的战略角逐，围绕“印太战略”背景下中美、中日韩等数字大国在其域内的数字经济竞争等研究主题，学界给予了充分关注。<sup>5</sup>在“合作”层面，国家间经贸交往，尤其是存在实力差距的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呈现出由强国主导并偏重获取利益的“硬合作”模式向双方协调、共创双赢的“软合作”模式转变，在以东盟为主体的数字经济合作中，美国、中国、欧盟等与东盟间的数字经济合作研究，已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sup>6</sup>尽管日本与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对于双方突破自身数字化发展阻碍，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学界聚焦日本对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转型的系统研究仍然较少，<sup>7</sup>且对日本的数字经济政策变化的关注，尚留有较大的研究拓展空间。

## 二、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政策调整的内涵

在急剧发展的数字化进程中，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着手制定新的开发构想，对他国数字经济合作的期待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东南亚市场的变化趋向，日本

<sup>3</sup> 伊藤聖聖. 共創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日本—新興国デジタル化時代の役割と課題—[J].NIRA オピニオンペーパー, 2021(59):2.

<sup>4</sup> アジア・大洋州地域委員会 ASEAN 経済連携強化部会. 新たな日 ASEAN 経済協力[EB/OL]. (2022-03-24)[2025-05-15].[https://www.keidanren.or.jp/journal/times/2022/0324\\_07.html](https://www.keidanren.or.jp/journal/times/2022/0324_07.html).

<sup>5</sup> 云倩,陆善勇.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遏制及中国的应对策略[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85-192; 蔡翠红,于大皓.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及其挑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6-39.

<sup>6</sup> 赵祺,李维昌.数字权力视角下美国在东南亚的数字合作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4):151-159; 赵祺.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现实与路径选择[J].南洋问题研究,2024(3):85-98; 张辉,张明哲.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0.

<sup>7</sup> 毕世鸿,张晗.日本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探析:进展、动因、挑战与前景[J].现代日本经济,2025(1):52-66;刘畅.日本—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吉林大学,2025.

政府和企业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对东南亚市场的角色定位、政策重点以及数字经济安全策略均出现相应调整。

### （一）角色定位：由援助对象转向“共创伙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战后复兴，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亚洲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活动频繁展开。在对东南亚的经济互动中，随时代发展主题不同，日本经历了从“政府开发援助提供者”，到“工业先进经验输出者”再到“发展课题经验分享者”的角色转变。<sup>8</sup>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以来，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影响，东南亚成为日本从中国进行供应链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同时，在数字化时代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东南亚正从世界生产基地转变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市场，其消费市场潜力和创新中心价值日益凸显，面对这一变化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

2023 年，以日本—东盟友好合作 50 周年为契机，日本政府提出“有必要重新认识与东盟间的经济关系”，“从为东盟的经济成长做贡献的立场，转变为共同成长的伙伴”，<sup>9</sup>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福田主义”的基础上，将构筑双边关系的三大支柱定位为“超越代际的心心相印的伙伴”“共同创造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合作伙伴”以及“和平与稳定的伙伴”，<sup>10</sup>在经济领域“共创伙伴”的关系构建中，除强调加强供应链和促进脱碳绿色转型等合作外，同时提出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开展标志性项目，具体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建设、东盟区域电子贸易体系构建以及日本与东盟青年商业领袖关系网络搭建等合作计划。2024 年，日本驻东盟大使纪谷昌彦在接受采访时将东盟在日本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更加具体地概括为“制造业基地、全球增长中心和理想的创新试验场”。<sup>11</sup>

与此前极为不同的是，新定位的“共创伙伴关系”的重要内涵之一，即是支持东南亚成功的初创企业作为“黑船”进军日本市场，通过数字经济等领域的逆向技术转移与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日本企业文化和社会变革，以应对日本数字变

<sup>8</sup> 伊藤亜聖. 共創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日本—新興国デジタル化時代の役割と課題—[J].NIRA オピニオンペーパー, 2021(59):2.

<sup>9</sup> 日本経済産業省. 日 ASEAN 経済共創ビジョン [EB/OL].(2023-08-22)[2025-05-15].<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8/20230822005/20230822005.html>.

<sup>10</sup> 日本外務省. 日本 ASEAN 友好協力に関する共同ビジョン・ステートメント [EB/OL].(2023-12-17)[2025-05-15].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601210.pdf>.

<sup>11</sup> 紀谷昌彦. 日・ASEAN 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で世界の課題解決を [EB/OL].(2024-08-09)[2025-05-20].<https://www.nira.or.jp/paper/my-vision/2024/73.html>.

革的内在需求。在日本的角色定位中，东盟已从传统的受援助者、经验学习者逐步向经济共建者、治理参与者，甚至是创新突破者升级，其在双边经济合作中的主体性与话语权显著提升，愈加促使日本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向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转变。

## （二）政策重点：由信息技术援助拓展至社会问题解决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发生系统性变革。为推进信息技术发展，2000年11月，日本设立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本部（简称“IT战略本部”），制定日本IT基本战略，出台《高速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开启了日本数字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次年，日本政府提出“e-Japan战略”，计划5年内建成世界最先进IT国家，重点推进超高速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后迎接数字社会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这一时期，虽然日本已以《东盟电子框架协议》等的推进为契机，在信息通信（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IT人才培养等领域为东盟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也开始为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家的IT政策制定和电信网络发展规划提供政策咨询。但是，由于东盟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尚处于萌芽阶段，大部分数字化倡议并未得到实施，<sup>12</sup>东南亚国家数字化的有限发展，使日本与其的数字化合作仍局限在被动的单线合作模式。

进入2010年代后，面对全球信息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东盟相继推出两个阶段的《东盟信息通信技术总体规划》，为其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更为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建设安全、可持续和变革性的数字经济体”也被纳入了“规划”的目标之一。<sup>13</sup>日本以东盟为中心，依托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在ICT领域的技术合作、专家派遣和人员培养规模。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数字化发展阶段各异，绝大部分国家在金融、医疗、物流等领域面临严峻的社会挑战，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以数字化转型推进社会问题解决的战略构想，日本积极调整合作策略，在强化“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的同时，推动ICT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服务相结合，为东南亚社会治理难题的解决提供方案。2011年12月，日本—东盟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提出“东盟

<sup>12</sup> 王佳睿,徐万胜.论数字经济与东盟一体化建设[J].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4):36-65.

<sup>13</sup> ASEAN ICT Masterplan 2020.ASEAN Main Portal[EB/OL]. (2021-08-07)[2025-05-20].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2015/November/ICT/15b%20--%20AIM%202020\\_Publication\\_Final.pdf](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2015/November/ICT/15b%20--%20AIM%202020_Publication_Final.pdf).

智能网络”构想，旨在以 2015 年为目标，在日本协助下，构建区域内的高速多功能 ICT 基础设施网络，并将 ICT 系统导入防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试图在促进东盟经济振兴和社会治理的同时，加强日本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对外发展。

14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成为东南亚国家加速推进数字技术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契机。2020 年 11 月，第 37 届东盟峰会正式发布《东盟全面复苏框架》（ASEAN Comprehensive Recovery Framework, ACRF），将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列为区域经济复苏战略的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初创企业搭建的数字平台已在农业现代化、医疗资源配置和物流体系升级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能源安全、粮食保障等可持续发展课题的破解，也亟需由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提供解决思路，这一需求为日本深度参与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而在全球议题的舆论调查中，东南亚民众对日本在气候对策等全球治理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期待已超过了美国、欧盟和中国<sup>15</sup>，这一认知倾向被日本各界视为巩固与东盟关系的巨大优势。因此，日本通过官民协作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企业等共同破解区域发展面临的社会难题，成为其提升在东南亚区域影响力，强化印太地区治理话语权的重要选择。

### （三）经济安全：由信息技术安全合作转向数字安全合作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确保安全的信息技术环境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凸显。2009 年 3 月，日本—东盟信息安全对策会议首次召开，针对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扩大等情况，双方提出加强构建东南亚的安全营商环境，推动各国应对网络攻击威胁等主张，其重点在于引导出海企业确保关键利益的信息安全。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2017 年“日本—东盟信息安全对策会议”更名为“日本—东盟网络安全对策会议”，确保国家间网络空间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成为双方的合作重点。其后，由于中国对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美国加强与日本为代表的亚太地区盟友的协调，以应对“经济胁迫”为名，促使其盟友参与在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竞争，以进一步增强在东南亚政治与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对中国形成挤压效应。

<sup>14</sup> 日本総務省. 日 ASEAN 情報通信大臣級会合の結果 [EB/OL].(2011-12-09)[2025-05-20].[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138410.pdf](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138410.pdf).

<sup>15</sup>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Southeast Asia Climate Outlook: 2024 Survey Report[EB/OL].(2024-09)[2025-05-20].<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4/08/SEACO24-Report-final.pdf>.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其首次日美首脑会谈中，双方提出基于“全球数字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新框架，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信息共享与合作，培育和保护对两国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提升日美两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这一框架成为日美同盟数字合作的新指针。2021年10月，拜登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构想，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14个经济体成为其成员，东南亚国家占据半数。在这一框架中，美国通过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围绕东南亚的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等领域，将其印太盟友与东南亚伙伴拉入“去中国化”的“共同价值观”联盟与关键技术供应链体系之中。

然而，在区域大国竞争中，东南亚国家长期实行多边平衡政策，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各国之间存在显著温差，因此，相较于以政治认同为中心的政治合作，以“经济共创”为侧重的经济路径更易成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突破口。作为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战略的重要一环，华为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基站业务成为日美谋划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战略的主要针对对象。2024年2月，日本通信运营商 NTT DoCoMo 与菲律宾通信运营商 Smart Communications、新加坡电信运营商 StartHub 等达成协议，开展开放式无线接入网（Open RAN）现场测验，日本乐天移动公司旗下的 Rakuten Symphony 电信基础设施平台也与菲律宾电信运营商 Now Telecom 签署了有关 5G Open RAN 试运营的谅解备忘录。2024年4月，美日菲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会后发表的《美日菲领导人共同愿景声明》将展开三方网络、数字合作与培养半导体人才作为其数字经济合作的重点内容。其中，明确提出“对经济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密切合作应对经济胁迫”。<sup>16</sup>在菲律宾部署 Open RAN 的合作，其目的即是加强与华为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通讯业务的竞争，实现其盟友内部的“通信经济安全”。

### 三、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政策调整的动因

东南亚在数字经济竞争中战略地位的跃升，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评估在东南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再次审视与东南亚国家间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传统合作模式。面对国际数字竞争激烈，国内创新乏力等发展形势，与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被日本各界给予了开拓海外市场，反哺创新转型，提升数字竞争力等多重期待。市

---

<sup>16</sup> 日本外務省. 日比米首脳による共同ビジョンステートメント [EB/OL].(2024-04-11)[2025-05-20].[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it\\_000001\\_00511.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it_000001_00511.html).

场变化、利益护持、战略对接与创新期待等因素交互影响，最终推动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

#### （一）市场变化：东南亚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市场

21 世纪以来，随着手机等廉价移动设备的普及与数据通讯费用的降低，东南亚的数字化进程加速推进。作为世界数字经济的新增长中心，其数字经济发展显现出强劲韧性和增长潜力。在国民对数字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依载智能手机等的数字经济发展为消费结构和服务体系的更新、升级提供了便捷路径。在此背景下，支撑消费需求的人口结构成为评估数字经济市场潜力的重要因素。截止 2023 年 7 月 1 日，东南亚国家总人口数为 6.5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数的 8.5%，市场规模较大，且年龄中位数仅为 30.2 岁。<sup>17</sup>大泉启一郎等日本学者认为 1985 年之后出生的“数字原生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的比例越高，其产业构造向数字化推进的可能性就越大。到 2030 年，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数字原生代”的人口比例将超过 70%，除了新加坡和泰国外，其他国家也将超过 60%。“数字原生代”对互联网的接受程度高，是推动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在人口结构中的高占比，使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市场具有广阔的消费潜力。<sup>18</sup>截至 2022 年，东南亚主要国家 15 岁以上的数字消费者有 3 亿 7000 万人，约占其 15 岁以上人口比例的 82%。<sup>19</sup>在对数字技术的接受态度上，东南亚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倾向，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接受数字技术的态度相对保守，约有 44% 的被调查者认为新技术带来的机会大于风险，但这一比例在菲律宾为 74%，在新加坡为 62%，东南亚民众对新技术的态度更加开放。<sup>20</sup>

与潜力市场的巨大需求相对应，数字企业以移动终端为侧重进行应用程序开发。在进入 2010 年代后，通过应用程序开发解决社会治理课题的初创企业模式从中国向东南亚地区渗透。以越南等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初创企业不受已有的数字基础设施或服务所制约，在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大力支持下，可以将数字技术快速地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中来，出现了数字化迅

<sup>17</sup>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EB/OL]. (2024-07) [2025-05-20].<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MostUsed/>.

<sup>18</sup> 大泉啓一郎. ASEAN の人口動態とデジタル化[J]. アジア研究所・アジア研究シリーズ, 2021(107):85-92.

<sup>19</sup> Meta and Bain & Company. Southeast Asia's Digital Consumers: A New Stage of Evolution[EB/OL].(2022-09) [2025-05-20].<https://www.bain.com/insights/southeast-asias-digital-consumers-a-new-stage-of-evolution/>.

<sup>20</sup> 博報堂.Media Innovation Lab レポート 3.0 注目すべき ASEAN デジタル市場の DX 最新情報 [EB/OL].(2023-02-21)[2025-05-20].<https://www.hakuhodody-holdings.co.jp/topics/2023/02/4058.html>.

速发展的“蛙跳”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线上消费、通讯和远程办公等业务的急剧扩张，东南亚非数字化领域的企业转向数字化的意愿也大幅增加。2022年东南亚主要国家数字经济的市场规模，较2019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940亿美元，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巨大，到2020年达到了1310亿美元。<sup>21</sup>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等联合发布的《2025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东南亚地区的数字市场规模在2025年将有望突破3000亿美元。<sup>22</sup>

因此，无论从互联网的普及趋势，还是市场数字化需求，亦或是消费主体的体量规模来看，东南亚地区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潜力市场。2014年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东南亚市场，有力推动了东南亚初创企业，特别是独角兽企业的迅速成长。根据美国数据智库CB Insights的统计，2021年风险投资市场推动初创企业估值飙升，东南亚地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独角兽公司，一年内激增了20家，<sup>23</sup>东南亚初创企业的融资金额和独角兽企业数量迅速超过了日本。<sup>24</sup>在此背景下，作为日本“心连心”的合作伙伴，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关注，促进日本与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等也成为其国内相关论著与调研报告聚焦的热点问题。<sup>25</sup>

---

<sup>21</sup> Google, Temasek and Bain & Company. e-Conomy SEA 2022[EB/OL].(2022-10)[2025-05-20].<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2/>.

<sup>22</sup>Google, Temasek and Bain & Company. e-Conomy SEA 2025[EB/OL].(2025-11)[2025-12-26].[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e\\_conomy\\_sea\\_2025\\_report\\_combined.pdf](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e_conomy_sea_2025_report_combined.pdf).

<sup>23</sup> JETRO.東南アジアのユニコーン急増、2021年中に20社 [EB/OL].(2022-01-12)[2025-05-20].<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2/01/10882d70533a726b.html>.

<sup>24</sup> 岩崎薫里. 第2ステージに突入した東南アジアのスタートアップ[J].RIM 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2022(22):105-201.

<sup>25</sup> 大泉啓一郎.デジタル時代の東南アジアビジネスの新潮流[J].JRI レビュー ,2017 (8):60-74;濱田美紀 編.ASEANと日本—変わりゆく経済関係—[M].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24:1-18;JETRO.日系企業にとっての東南アジアのイノベーション創造活動環境の現状評価に関する調査 [R/OL].(2022-08-31)[2025-06-21].<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22/02/ced1303d5398107a.html>;経済産業省,PwC.東南アジア・インドにおけるスタートアップ投資の現状と日本企業への提言 [EB/OL].(2020-05-25)[2025-06-20].[https://www.meti.go.jp/policy/external\\_economy/toshi/kaigaima/image/20200525\\_01.pdf](https://www.meti.go.jp/policy/external_economy/toshi/kaigaima/image/20200525_01.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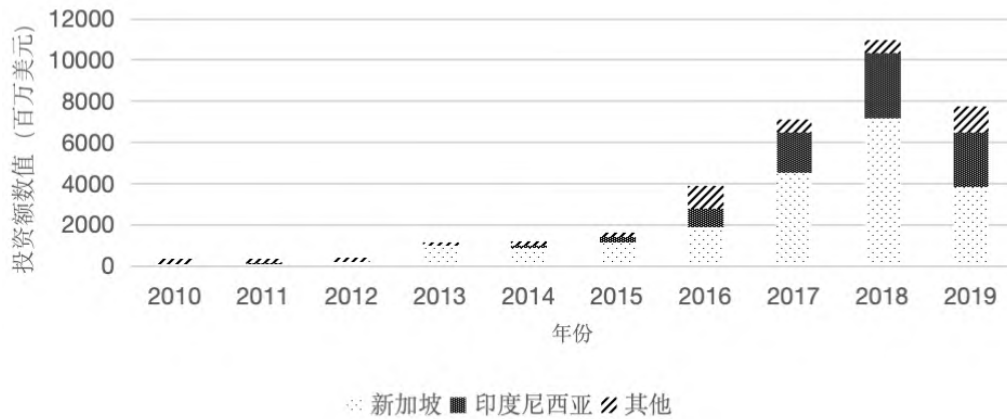


图1 东盟初创企业引入投资额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开信息整理。

## (二) 利益护持: 日本谋求保持在东南亚数字经济市场的竞争优势

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形式参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建设,不仅促进了东南亚的经济增长,也反哺推动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发展,东南亚成为日本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地区。在向海外扩张的日本企业中,约有30%的企业总部设在东盟,日本在制造业领域对东南亚国家的累计投资额,以压倒性优势位居国别投资榜首。<sup>26</sup>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中影响力加大,但是日本仍旧维持了相对优势的地位,2019年日本在东南亚六国承包的工程总值为3670亿美元,约为中国的1.5倍。<sup>27</sup>然而,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基础设施竞争优势,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优势并未及时转化为其与东南亚各国数字经济合作的发展优势。

20世纪70至80年代,ICT产业与汽车产业成为日本“电子立国”的支柱,日本政府积极倡导、推进与东南亚各国建立通信卫星与海底电缆相互补充的国际通信网络,以促进日本电子产业的出口,提升其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优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和移动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

<sup>26</sup> アジア・大洋州地域委員会 ASEAN 経済連携強化部会. 新たな日 ASEAN 経済協力 [EB/OL].(2022-03-24)[2025-06-20].[https://www.keidanren.or.jp/journal/times/2022/0324\\_07.html](https://www.keidanren.or.jp/journal/times/2022/0324_07.html).

<sup>27</sup> Bloomberg. 日本が中国を引き続きリード—東南アジアのインフラ開発競争 [EB/OL].(2019-06-24)[2025-06-20].<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9-06-24/PTL8L06K50XS01>.

日本 ICT 产业在绝大多数领域的世界影响力开始下降。<sup>28</sup>随着物联网社会的到来，2016 年日本总务省将传统 ICT 市场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市场进行了区分，根据 2024 年发布的《IoT 国际竞争力指标》，自 2018 年以来，日本企业在 ICT 和 IoT 领域的市场份额均呈现出下降趋向。<sup>29</sup>

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发展受市场需求驱动的特征明显。数字品牌的认可度是 ICT 市场反馈的重要表征。与中国数字品牌在东南亚地区认可度的提升相比，日本数字品牌的影响力劣势明显。2023 年 5 月，亚洲著名消费调查杂志 Campaign Asia-Pacific 发布了东南亚消费者最受欢迎企业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排名前 50 名的企业中，企业总部位于美国的有 16 家，欧洲企业有 14 家，中国企业有 6 家，东南亚本地企业有 5 家，日本企业有 4 家。尽管美国和欧洲的企业总数较多，但是其中数字企业仅分别有 4 家和 2 家，中国的 6 家上榜企业中数字企业为 5 家，而日本的数字企业未进入排名。<sup>30</sup>

表 东南亚 50 大热门消费品牌总部所在国家/地区分布

| 创立时期      | 企业数量 | 企业数量 |     |     |     |     |     |
|-----------|------|------|-----|-----|-----|-----|-----|
|           |      | 美国   | 欧洲  | 中国  | 东南亚 | 日本  | 其他  |
| 合计        | 50   | 16   | 14  | 6   | 5   | 4   | 5   |
| (数字企业数量)  | (16) | (4)  | (2) | (5) | (4) | (0) | (1) |
| 1980 年代以前 | 35   | 13   | 12  | 1   | 1   | 4   | 4   |
| (数字企业数量)  | (2)  | (1)  | (0) | (0) | (0) | (0) | (1) |
| 1990 年代   | 2    | 1    | 1   | 0   | 0   | 0   | 0   |
| (数字企业数量)  | (2)  | (1)  | (1) | (0) | (0) | (0) | (0) |
| 2000 年代   | 5    | 2    | 0   | 2   | 0   | 0   | 1   |
| (数字企业数量)  | (4)  | (2)  | (0) | (2) | (0) | (0) | (0) |
| 2010 年代   | 8    | 0    | 1   | 3   | 4   | 0   | 0   |

<sup>28</sup> 日本総務省. 情報通信白書 2021[EB/OL].(2021-08)[2025-06-20].<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

<sup>29</sup> 日本総務省. IoT 国際競争力指標 2022 年実績 [EB/OL].(2024-04)[2025-06-20].<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linkdata/sihyo2023.pdf>.

<sup>30</sup> 日本総合研究所. 東南アジアのデジタル化をけん引する中国 IT 企業[J]. アジア・マンスリー, 2023(23):1-2.

资料来源：日本総合研究所.東南アジアのデジタル化をけん引する中国 IT 企業[J].アジア・マネスリ  
-,2023(23):1-2.

另一方面，日本与其他主要数字发展先进国相比，对东南亚投资等的差距正在扩大。2014 年后，各国资本对东南亚市场的关注显著增加。从风险投资的动向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东南亚等新兴地区初创企业的投资总额至 2019 年总体呈上升态势，但是日本的份额在 2016 年到达峰值 22.7%后，开始进入下滑趋向，2019 年其份额仅有 3.2%。<sup>31</sup>截止到 2024 年 7 月，东南亚地区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共有 31 家，其中美国资本投资的独家兽高达 21 家，有中国资本注入的独角兽有 12 家，而日本资本仅有 1 家。<sup>32</sup>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中，各国投资迅速涌入东南亚，但曾主导东南亚投资的日本却显现出愈加“消极”的动态，与中美两国间的差距明显。日本如何瞄准在东南亚数字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掘自身优势，及时改变竞争力下行趋势，成为日本对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 (三) 战略对接：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印太地区秩序

冷战结束后，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始终是日本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核心战略诉求。在中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印太地区作为全球地缘战略增长中心，成为日本角逐区域主导权的关键场域。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的深度推进使科技赋能在“多重+分层”的国际体系下，<sup>33</sup>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作用愈发凸显。2016 年，日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战略，经其政府不断推进，FOIP 成为日本塑造地区秩序，拓展国家利益的核心框架。在日美等国相继提出“印太战略”的背景下，2019 年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强国积极推动《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AOIP）出台。AOIP 的提出不仅代表着东盟为应对周边政治经济环境复杂性加剧的形势需要，维护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参与区域治理与规则构建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也为日本将其嵌入自身“印太构想”，使“东盟中心性”原则转化为

<sup>31</sup> 日本経済産業省.東南アジア等・インド地域を対象にしたアジア DX 具体化に向けた実態調査 [R/OL].(2021-03)[2025-06-21].[https://www.meti.go.jp/medi\\_lib/report/2020FY/000054.pdf](https://www.meti.go.jp/medi_lib/report/2020FY/000054.pdf).

<sup>32</sup> Global Unicorn Club.Private Companies Valued at \$1B+[R/OL].(2021-03)[2025-06-21].<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unicorn-companies>.

<sup>33</sup> 唐家林,费建华.日本“印太战略”的多重身份追求[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5(5):46.

“日本+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模式提供了契机<sup>34</sup>。

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升级,美日两国依托东南亚地缘政治优势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清晰。在战略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对暗含“选边站”的合作提议保持着相当警惕。为缓解东盟国家的战略疑虑,日本通过搭建多层次合作机制,屡次强调 FOIP 所秉持的“自由开放”核心原则与 AOIP 倡导的开放、包容、法治等价值理念的一致性,着重凸显日本与东盟国家的“价值共识”及“志同道合国家”的身份认同,强化在印太地区合作的双方共识。在具体操作层面,相较于“对抗性”色彩较为浓厚的政治、军事领域,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韧性构建等为中心的经济领域是日本印太战略的重要政策支点。其中,针对东盟各国在数字技术与设施领域的迫切需求,日本将其作为双方开展区域合作的切入点。2020年11月,在“东盟—日本峰会”期间,双方首次在 AOIP 框架下达成联合声明,明确表达了推动 AOIP 与 FOIP 互联协作的积极意向。此后两年间,双方在海洋合作、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经济等领域累计实施了 89 个合作项目,其中智慧城市网络建设、供应链韧性强化支援、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成为双方深化数字经济联结的合作重点。2023年,第 29 届东盟—日本经济部长会议正式批准了《2023—2033 年东盟—日本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共创未来设计和行动计划》,在该计划推进的四大支柱领域中,数字经济已成为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sup>35</sup>日本以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为重要抓手,推进 FOIP 与 AOIP 的战略对接,进一步夯实与东盟的长期合作基础,为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坚实支撑,最终强化对区域秩序构建的主导权。

#### (四) 创新反哺: 日本在数字化发展滞后背景下的合作期待

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日本的数字化进程相较于世界先进国家已处于滞后状态。根据全球数字竞争力报告,近年日本数字竞争力的世界排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23 年较上一年度下降 3 位,在 63 个国家中位居第 32 位。从单项指标来看,日本数字竞争力评估“人才”指标中的“国际经验”、“业务敏捷性”指标中的“企业的敏捷性”“对大数据和数据的利用”等均位列末位,<sup>36</sup>日本传统商业模式对其数字创新局限明显。而在联合国以电子政务为中心开展

<sup>34</sup> 程蕴.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推进过程中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J].日本学刊,2021(5):106.

<sup>35</sup> Future Design and Action Plan for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ASEAN-Japan Economic Co-Creation 2023-2033[EB/OL].(2021-08)[2025-06-20].<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8/20230822005/20230823005-8.pdf>.

<sup>36</sup>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 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的调查中，2003年至2020年间，日本的排名范畴大致在18位到10位之间，其中，受人口老龄化与从业人员工作经历特点等因素制约，人力资本指标排名始终低于通信基础设施指标和在线服务指标。<sup>37</sup>

综合来看，日本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受多重因素制约。首先，在传统 ICT 框架下日本数字化发展的问题已经显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85年为止，日本 ICT 相关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其后，受日元升值等因素影响，日本 ICT 相关产业出口增长放缓，进入21世纪后日本电子产业的国内产值迅速下滑，出口额也呈下降趋势。日本 ICT 投资自1997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呈现减少倾向，其中八成被用于维持和运营现有业务，<sup>38</sup>这使得日本的数字化建设仍未脱离原有的思维与框架。在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对系统开发的流程性规范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敏捷性要求。在网络开放性、云计算和数据标准化等方面的滞后，使日本数字业务的效率化和数据运用等方面面临难以推进的状况。其次，在长期雇佣制度下，日本企业形成的对数字人才雇佣的多层分包结构，与以委托开发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共同制约了日本企业自上而下的数字战略规划的制定。而由此产生的日本数字企业的管理体系与偏重效率化的保守投资更相适应，但也阻碍了需要反复试验和随机应变的创新性投资的发展，<sup>39</sup>使得日本在与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中仍将合作的重点集中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基于数字创新模式的市场争夺方面则相对弱势。再次，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的 ICT 人力资源处于短缺且分布不均的状况，尤其是当前对于具有信息安全等先进 ICT 技能、能够应对敏捷开发等新领域的人才的需求量巨大，但日本企业中表示“明显缺乏”或“轻微缺乏”的比例高达90.5%。<sup>40</sup>专业技术型人才不足成为日本数字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重要命题。日本亟需在企业传统、管理模式和人才短缺等方面找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

2023[EB/OL].(2023-11-30)[2025-06-20].[https://www.investchile.gob.cl/wp-content/uploads/2024/08/Digital\\_2023.pdf](https://www.investchile.gob.cl/wp-content/uploads/2024/08/Digital_2023.pdf).

<sup>37</sup> 日本総務省. 情報通信白書

2021[EB/OL].(2021-08)[2025-06-20].<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

<sup>38</sup> JUAS.企業 IT 動向調査報告書

2020[R/OL].(2020-04-10)[2025-06-20].[https://juas.or.jp/cms/media/2020/05/JUAS\\_IT2020\\_original.pdf](https://juas.or.jp/cms/media/2020/05/JUAS_IT2020_original.pdf).

<sup>39</sup> 市川類.「何故、日本のデジタ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は遅れているのか」～デジタ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システムの比較制度分析からみた日本企業・政府の構造的課題～

[EB/OL].(2020-12)[2025-06-20].<https://hermes-ir.lib.hit-u.ac.jp/hermes/ir/re/71051/070iirWP20-16.pdf>.

<sup>40</sup> 日本総務省. 情報通信白書

2021[EB/OL].(2021-08)[2025-06-20].<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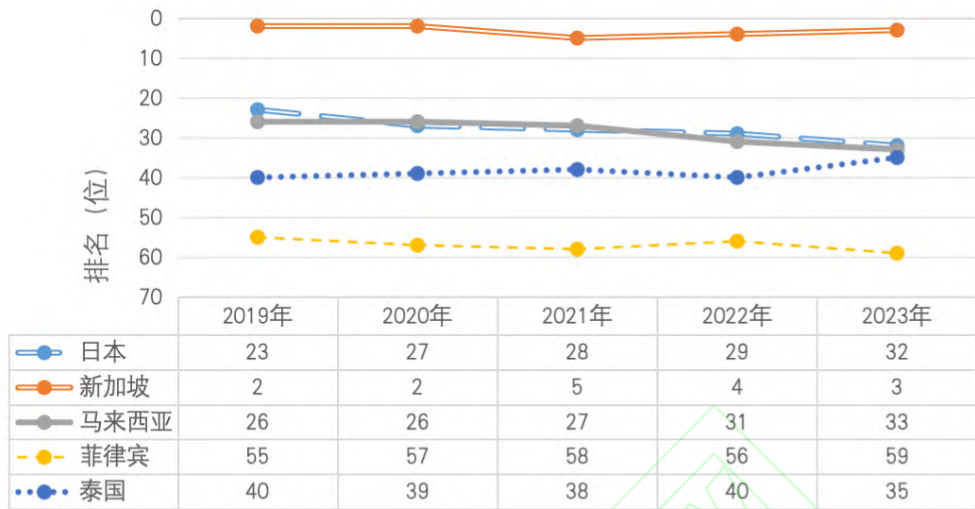


图2 2019—2023年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24年世界数字竞争力年报》（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绘制。

在此情况下，东南亚等成为日本打造数字化伙伴关系的重点。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部分东南亚数字先进国家已显现出不亚于日本的竞争潜力。从总体指标来看，近年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巨大差距正呈现相对缩减的趋势。截止2024年7月17日，全球共有1243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公司，其中美国640家，中国大陆167家，东南亚地区30家，但日本仅有8家。<sup>41</sup>而独角兽公司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从数字竞争力来看，相较于日本数字竞争力排名连续下降的趋势，新加坡却始终保持着强劲势头，马来西亚的数字竞争力排名与日本相当，而以泰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数字竞争力则逐步增强。<sup>42</sup>由于制约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创新的固有体系、法规等较少，为其创新模式的塑造提供了宽松的成长条件，东南亚国家更易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模式的创新，而日本政府希望由此带来的“创新回流”可以推动日本产业改革，使日本由“制造业中心”向“服务和创新中心”转变。<sup>43</sup>另一方面，东南亚与日本在数

<sup>41</sup>Global Unicorn Club.Private Companies Valued at \$1B+[R/OL].(2021-03)[2025-06-21].<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unicorn-companies>.

<sup>42</sup>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4[EB/OL].(2023-11-14)[2025-06-20].[https://www.investchile.gob.cl/wp-content/uploads/2024/08/Digital\\_2023.pdf](https://www.investchile.gob.cl/wp-content/uploads/2024/08/Digital_2023.pdf).

<sup>43</sup>ADX政策推進チーム.新興国企業との共創による新事業創出～アジア・デジタ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ADX)～[EB/OL].(2019-09-17)[2025-06-20].[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eicho\\_senryaku/pdf/001\\_07\\_00.pdf](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eicho_senryaku/pdf/001_07_00.pdf).

数字化发展中经济互补的特征仍旧明显。东南亚国家多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意愿。但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发展由市场需求驱动的特点，决定了其将极大依赖国外资金、技术等资源，而这正是日本聚焦的互补性投资的优势所在。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强双方的人员交流与合作不仅对缓解日本因老龄化带来的数字技术人才不足，推动东南亚的技能人才培养等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企业家和青年学生交流的增多，也将深化双方经济共创的人力基础。

#### 四、日本深化与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路径

为推动对东南亚数字经济政策调整的有效落地，日本既注重对累积的基础设施优势的利用，又在规则竞争中积极寻求主导权，同时着眼于增进双方未来发展联结的合作部署，其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举措，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 （一）夯实基础：深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与技术合作

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虽在角色定位、合作重点等层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但从投资结构与供应链布局来看，仍未脱离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合作为主的既有结构。鉴于东南亚国家数字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差异化现状，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构建契合东南亚本土需求的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合作仍是当前日本深化与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路径。

硬件基础设施投资是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重要举措。伴随东南亚各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发展，日本从资金援助、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与软件基础设施配套等层面，系统构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与技术合作体系。在硬件基础设施的推进中，日本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叙事，强化其技术标准与质量优势，与东南亚国家围绕“互联互通”的核心需求，不断加强双方在“物理互联互通”与“网络互联互通”等领域的相互合作。2020年后，数字转型与数字经济合作逐渐成为日本—东盟峰会中双方合作的核心议题。日本对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合作愈加注重从经济安全保障与次世代市场开拓的角度部署出口战略。2024年6月，日本“经协基础设施战略会议”召开，指出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日本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官民协作获得5G、太空通信和海底光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海外订单，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出口成为《基础

设施海外拓展战略 2030》的政策重心。<sup>44</sup>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出口中，日本政府强调重点推进 5G/Open RAN 等低成本通信网络合作，同时推动日本数字产品在 6G 标准制定完成前实现全球市场渗透，加速次世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落地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针对东南亚地区对 AI 技术应用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日本重点推进数据中心、海底光缆等数字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sup>45</sup>2025 年 1 月，第四届日本—东盟数字部长会议发布《日本—东盟数字工作计划 2025》，进一步明确将 Open RAN 推广、网络安全领域能力建设支援、人工智能政策协同列为重点合作方向。

另一方面，随着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进程的深化，区域内各国对基础设施服务化及业务高端化的需求不断增加，数字软件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东南亚国家以数字化措施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智慧城市、智能农业、智慧医疗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等成为日本分享其数字技术解决社会治理课题经验，参与东南亚国家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确保数字基础设施出口的长期化，日本积极实施海外基础设施拓展人才专项计划等支援项目，通过亚太电信组织（Asia-Pacific Telecommunity, APT）、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 JAIF）、日本—东盟 ICT 基金等多边平台，为东盟成员国提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培训资金，支援面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的人才培养，尤其注重强化网络安全领域的人员交流与合作。2018 年，在 JAIF 的支持下，东盟—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心（ASEAN-Japan Cyber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Centre, AJCCBC）在曼谷正式成立，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形式为东盟各国政府机构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提供网络防御演练和安全培训，以促进东盟网络安全能力的提升与日本数字基础设施出口战略的紧密结合。2023 年 3 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启动“加强东盟—日本网络安全和数字信任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专项支持 AJCCBC 的运营工作，截至 2024 年 11 月，该项目已累积培训 2395 人次，<sup>46</sup>对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安全运营的能力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

<sup>44</sup> 日本経済新聞. 5G や宇宙、経済安保を重視インフラ輸出戦略の骨子

[N/OL].(2024-06-05)[2025-06-20].<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4BQV0U4A600C2000000/>.

<sup>45</sup> 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 インフラシステム海外展開戦略

2030[EB/OL].(2024-12-04)[2025-06-20].<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uu/dai58/siryuu6.pdf>.

<sup>46</sup> 外務省. 2024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EB/OL].(2025-03-14)[2025-06-20].<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100811507.pdf>.

## （二）构建规则：主导域内数字经济领域的议题设置与规则制定

数字经济作为数字技术革新驱动人类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兴领域，其国际议题设置与规则制定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在区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日本凭借其数字产业基础与制度优势，通过议题引领和规则输出，逐步强化对印太地区数字治理议程的主导权，致力构建以日本标准为核心，契合其国家利益的区域数字治理框架。

随着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协调建立国际数据治理机制的需求日益高涨。日本率先启动了主导数字规则的战略规划，将东南亚地区视为推动日本数字治理规则国际化的重要支点。在议题设置层面，日本以“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数据跨境流动规范化”“数字贸易便利化”等为核心议题，充分借助多边机制与主场外交优势，实现其关注议题的国际扩散。2019年6月，日本政府推动G20大阪峰会发布《数字经济大阪宣言》，宣布正式启动“大阪轨道”（Osaka Track）进程。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提出，推动数据流动与电子商务规则的国际协调是当务之急，需加速推进相关国际合作。作为东道国，日本首次系统提出了“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动”（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DFFT）概念，主张在平衡个人隐私保护、伦理准则和知识产权与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数据的自由流通与规则制定，试图促进日本的数据流动规则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共识，进而提升其在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在规则输出层面，日本通过多层级机制与协议网络，推动DFFT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具体制度安排，并强化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规则渗透。2023年，日本利用其担任G7主席国的契机，主导启动了DFFT实施的国际框架——“伙伴关系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Partnership, IAP），并推动其作为OECD的下设机构正式成立，为DFFT的规则落地提供了具体抓手。此后，日本通过《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数字经济协议，日本—东盟数字部长级会议、东盟峰会等多边对话机制，以及《日本—东盟数字工作计划》等具体实施规划不断推进东南亚国家对DFFT规则的理解和利用，并将日本塑造为OECD国家与东盟国家间数字经济合作的“桥梁”，凸显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不可或缺性”。

2023年12月，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ASEAN Digital Economy Framework

Agreement, ASEAN DEFA) 谈判正式开启, 其核心目标是加强东盟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 提升东盟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 该协议被视为东盟实现数字转型的重要突破。日本对东盟 DEFA 的谈判动向给予高度关注, 通过日本—东盟经济大臣会谈等多场合, 向东盟传递以“共创伙伴”身份, 推进 DFET 规则与 DEFA 的制度融合, 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数字安全标准等领域寻求规则协同。2025 年 10 月, 东盟经济共同体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理事会宣布 DEFA 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该协议有望成为全球首个最全面的区域数字经济协议, 并计划在 2026 年全面完成并签署,<sup>47</sup>这一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未来日本或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项目合作等方式, 持续推动其规则在 DEFA 实施过程中的逐步渗透, 进而巩固其在东南亚数字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 (三) 孵化新生: 加强初创企业投资与人才培养合作

在国外投资与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双重作用下, 东南亚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呈现出由“雁行发展模式”向全球价值链模式转变的发展特征, 在这一进程中, 中小企业、中坚企业和初创企业对经济增长与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sup>48</sup>与在发达国家, 大企业往往对产业和国家发展及社会问题的解决起主导作用不同, 东南亚国家大企业较少, 中小企业在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包括初创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解决了绝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部分初创企业甚至影响国家法规和总体规划的制定。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东盟拥有的宽松创新环境与投资机遇使大量初创企业在短时间内诞生, 深刻地影响着东南亚的经济发展进程。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初创企业的支持, 涵盖了资金投资、技术合作和市场拓展等广泛领域。2019 年 3 月, 伊藤忠商事与新加坡健康科技公司 Docquity 建立了资本和业务合作关系, 该公司为东南亚的医生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提供 SNS 业务, 使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实现医护、医患沟通, 提供医疗教育培训等, 伊藤忠商事向其已有资本业务合作的亚洲医院、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企业推广 Docquity 公司的服务, 以扩大伊藤忠商事在亚洲医疗保健行业的业务,<sup>49</sup>为日本

<sup>47</sup>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uncil.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uncil Statement on the Substantial Conclusion of the ASEAN DEFA Negotiations[EB/OL].(2025-10-24)[2025-12-25].<https://asean.org/asean-economic-community-council-statement-on-the-substantial-conclusion-of-the-asean-defa-negotiations/>.

<sup>48</sup> 日本経済産業省.日 ASEAN 経済共創ビジョン [EB/OL].(2023-08-22)[2025-06-20].<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8/20230822005/20230822005.html>.

<sup>49</sup> JETRO.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イノベーション創造活動に関する調査

与东南亚企业合作进行市场拓展提供了模范样板。在技术合作层面，2021年，日本农业机械制造公司久保田投资了泰国的软件初创公司 Listen Field，Listen Field 主要面向泰国农民提供农作物指标数据、共享机械等农业支持服务，久保田与其合作共同开发智慧农业技术，以此实现在东南亚国家推广其技术产品。

此外，《日本—东盟经济共创愿景》将人才交流视为日本与东盟间经济共创的基础，提出从“人才交流机会最大化”和“人才培养机会最大化”两方面“构建共创活力的人力资本生态系统”。前者注重对未来数字经济企业领导者的交流合作，既包含了日本与东南亚地区间大学和科研机构青年人才的双向交流，又包括日本向东盟地区派遣本国企业家和学生等，从企业联系和年轻一代开始耕植两国数字经济联结的人力关系基础。后者聚焦于对数字经济领域的高技能人才资源的培训。早在2018年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就提出，作为“产业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倡议2.0”的一部分，此后五年将对东盟提供包含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在内的8万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援助。2024年5月，第29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召开，日本政府再次表示将与东盟国家合作，在此后五年培养10万名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相关的数字领域的高端人才，<sup>50</sup>面向数字技能人才的目标更加明确，援助的力度更加强大。在对东南亚的人才交流中，日本不仅强调对东南亚数字人才的技能培养和对未来数字经济企业领导者的关系构建，也注重利用东南亚的人力资源优势，吸收多样性的数字人力资源在日本就职和创业，由此推动促进数字化时代日本经济增长的新产业诞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将重新评估日本企业的工资体系、成果引进等措施纳入企业改革方向。

51

## 五、结语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后，25日即在东南亚迎来其首次出访。在第28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高市再次重申将在FOIP与AOIP相协同的框架下深化双方数字经济合作。在“值得信赖的伙伴”等理念的指引下，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合作仍将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协作的核心议题。这是日本在全球数字经济变革、区域发展需求升级及自身发展困境叠加下的战略选

---

[EB/OL].(2022-08-31)[2025-06-20].<https://www.jetro.go.jp/world/reports/2022/02/ced1303d5398107a.html>.

<sup>50</sup> 首相官邸ウェブサイト. 第27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さん会 岸田総理スピーチ

[EB/OL].(2022-05-26)[2025-08-17].[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526speech.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526speech.html).

<sup>51</sup> 日本経済産業省. 日ASEAN 経済共創ビジョン

[EB/OL].(2023-08-22)[2025-06-20].<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8/20230822005/20230822005.html>.

择,其背后折射出日本对东南亚合作逻辑的深层转型,也为理解区域经济关系演进与全球数字治理格局提供了重要观测样本。

从合作根基来看,日本与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延续了双方半个多世纪积累的紧密关系积淀。过往依托“雁行发展模式”形成的制造业分工体系、以 ODA 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为双方奠定了互信基础与渠道资源。而从发展导向来看,这一合作关涉着面向不确定性未来时双方破解发展困境的模式探索。在全球经济波动加剧、技术变革重塑产业格局的背景下,双方通过数字经济领域的协作探索,试图突破传统合作中固有模式的路径局限,为破解各自发展困境提供解决方案。

在这一进程中,日本虽有在长期发展援助中形成的合作优势和良好的国家形象,但是也不得不面临着其相较于中美等数字发展大国,成为“数字落后国家”的相对劣势,在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数字化差距缩小的新形势下,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战略在合作角色、政策重点与对美协调等方面逐步调整,逐渐明确了其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为根基,以议题设置和规则输出为赋能路径,以投资初创企业、培养数字人才为深化手段的合作路径。

日本对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的战略转型,是其在数字革命浪潮中争夺区域影响力的典型实践。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战略内涵,也引发了在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形势下,先进经济体对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形式的反思。随着全球数字竞争格局的深化调整,日本对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战略的演进方向,及其在区域与全球数字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仍将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 参考文献:

- [1]毕世鸿,张晗.日本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探析:进展、动因、挑战与前景[J].现代日本经济,2025(1).
- [2]蔡翠红,于大皓.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及其挑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 [3]程蕴.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推进过程中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J].日本学刊,2021(5).
- [4]王佳睿,徐万胜.论数字经济与东盟一体化建设[J].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4).
- [5]云倩,陆善勇.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遏制及中国的应对策略[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 [6]张辉,张明哲.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 [7]赵祺.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现实与路径选择[J].南洋问题研究,2024(3).
- [8]赵祺,李维昌.数字权力视角下美国在东南亚的数字合作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4).
- [9]伊藤重聖. 共創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日本—新興国デジタル化時代の役割と課題—[J].NIRA オピニオンペーパー,2021(59).
- [10]岩崎薫里. 第2ステージに突入した東南アジアのスタートアップ[J].RIM 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2022(22).

- [11]大泉啓一郎.デジタル時代の東南アジアビジネスの新潮流[J].JRI レビュー ,2017 (8).
- [12]大泉啓一郎.ASEAN の人口動態とデジタル化[J].アジア研究所・アジア研究シリーズ, 2021(107).
- [13]濱田美紀編.ASEAN と日本—変わりゆく経済関係—[M].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24.
- [14]日本総合研究所.東南アジアのデジタル化をけん引する中国 IT 企業[J].アジア・マンスリー,2023(23).

